

時英余●

曾國藩先生

的

士大夫之學

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為當代史學大家，日前應故宮博物院之邀，為「曾國藩逝世雙甲子紀念演講會」專程返國，發表專題演講「曾國藩的士大夫之學」，從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成學過程與讀書之道，探討曾國藩學問的整體面貌，精闢詳實，極具價值，本刊特徵得主辦單位同意，將其講稿全文刊出，以饗讀者。（編者）

【歷史背景】

道光時代的

學術界

曾國藩生於嘉慶十六年，他的成學則在道光時代。我們必須對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術狀況有一個概括的認識，然後才能瞭解曾國藩的學術淵源之所自。近人王國維說：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道、咸而稍偏至者，學者尚承乾、嘉之風，然其時政治、風俗已漸變於昔，國勢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憂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於先秦、兩漢之學以圖變革一切，然

頗不循國初及乾、嘉諸老為學之成法。如龔璣、魏默深之儔，其學在道、咸後雖不逮國初、乾嘉二派之盛，然為此二派之所不能攝，其逸而出此者，亦時勢使之然也。

王國維論道光、咸豐以降的學術新方向，因限於壽序的文體，僅舉龔自珍、魏源的今文經學為代表。但他在嘉慶與道光之間截然劃一學術史上的分界，則是十分確切的。

所謂道光學術之「新」，本相對於乾嘉而言。乾嘉的經學考證以「漢學」為標榜，當時幾乎有「定於一尊」的趨勢。袁枚說：「近今之士，競爭漢儒之學，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爭先焉。」這是親見漢學盛世的人的證詞。下及嘉慶時期，情況依然未變。滿清宗室昭槱在嘉慶二十年左右寫的《嘯亭雜錄》中，記載：

自于（敏中）、和（坤）當權後，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黠者詭

置正人，以文己過，迂者株守考訂，皆議宋儒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余嘗購求薛文清（瑄）《讀書記》及胡居仁《居業錄》諸書於書坊中，買者云：「近二十餘年，坊中久不貯此種書，恐其無人市易，徒傷費本耳！」傷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歟？

嘉慶時北京書店竟買不到理學的書。如果不是看到這筆記我們是很難想像的。漢學考證的獨霸之局，進入道光時期，便開始瓦解了。這有兩方面的原因：在消極方面，乾隆時代的最後幾位大師都在嘉慶年間死去了，如錢大昕死在嘉慶九年，程瑤田死在十九年，段玉裁死在十年。道光初年，雖然王念孫、引之父子尚存，阮元更是經學考證的有力護法，但漢學盛極而衰，它的霸權畢竟不能維持了。最有象徵意義的一件事莫過於方東樹在道光六年寫成《漢學商兌》一書（刊於十一年）。方氏是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

道光初年他正在廣州阮元的幕府中。《漢學商兌》完稿後，他即獻之阮元求教。這是一部最有系統的反漢學的著作，作者深入漢學堂奧，入室操戈，所以刊行後引起重大的反響。清末李慈銘頗為漢學辯護，但他也不能不承認方氏「頗究心經注，以淹洽稱，而好與漢學為難」。《漢學商兌》一書，多所彈駁，言偽而辯，一時漢學之餘，幾為之熄。一「漢學之餘，幾為之熄」自然是一句誇大之詞，但《漢學商兌》確是正式向漢學霸權挑戰的一個信號，這就表示道光以後中國學術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了。

在積極的一方面，新的時勢對於學術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這些要求則不是經學考證所能滿足的。乾隆一朝是清代所謂「太平盛世」。儘管乾隆時期各種社會和政治的危機已開始出現（如「回亂」、「川楚教匪」之類），但表面上還能維持著一種「太平」的假象。漢學考證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在乾隆中葉不但是以點綴太平，而且也為整理學術傳統提供了一種機會和條件。當時許多第一流的人才都願意獻身於此，也是因為他們在其中獲得了求知的樂趣、發揮了創造的精神。但道光以後，內憂外患同時併發，深刻的危機感使許多讀書人都不復能從容治學，走經典考證的老路了。這時的知識界可以說是普遍地要求改變現狀。而且這種要求早在嘉慶一朝便已見諸文字。例如關於士大夫的風俗頹壞，洪亮吉、管同諸人先後都有很嚴厲的指責。又如對於新人才的期待，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詩句更是萬口傳誦。曾國藩的「原才」之所以成為名篇正是因為他用簡練有力的古文把「轉移習俗以陶鑄一世之人才」的意思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如果我們不認清歷史背景，便不可能真正掌握曾氏的思想淵源。

道光以下的學術精神從古典研究轉為經世致用，大體上說，有兩個比較顯著的趨向：第一是理學的重新抬頭，第二是經世之學的興起。這兩個趨向都與曾國藩的學術成就有密切的關係。就第一層言，方東樹向漢學挑戰同時即是為「宋學」作平反

，並由此而展開了一場長期的漢宋之爭。（也可稱之為考證與義理之爭）但是在考證的成績大顯之後，提倡宋學的人也不能完全否定漢學的功用。所以爭議的焦點最後集中在如何融匯漢宋。陳澧晚年的《東塾讀書記》是這一大問題一個總結。曾國藩在這一方面也有重要的貢獻。他曾旗幟鮮明地宣稱：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

在那個時代，這種斬截的態度對於理學是發生了起信的作用的。關於這一點，下面將有進一步的討論。

就第二層說，經世之學的內容相當複雜，舉凡道、咸以下的新興學術如禮制、史學、掌故、時務（如漕運、鹽法、河工、兵餉等）邊疆與域外史地等無不與「經世」有關。即使是今文經學，名為解經，其實也是要為變法、改制提供經典的根據，其基本精神即是所謂「通經致用」。我們不妨說，道光以下的理學與經世學是一事之兩面，統一在實踐這個觀念之下，所不同者，理學注重個人的道德實踐，經世則強調整體的社會、政治實踐。因此在精神上，兩者與乾嘉經學之為學院式的研究，恰恰相反。

道光六年魏源為賀長齡輯成《皇朝經世文編》，這是晚清經世思想出現的標誌。《晚明社會危機深重，陳子龍等於崇禎十一年編輯《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卷。此書即賀、魏所取法。》《經世文編》收錄顧炎武《日知錄》中，這也反映了道光時學者的一種共識。李兆洛在道光初特別指出《日知錄》論時務八卷為全書精華所在。同時黃汝成撰《日知錄集釋》，也說顧氏「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總之，道光以後學者推重顧炎武主要在他的「經世」之學，與乾、嘉時奉他為經學考證的開山大師大不相同。

曾國藩在北京翰林院進修時期便受到經世學風的感染。根據他的《日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收到家中寄來一部《皇朝經世文編》，三十日他便開始閱讀。這部書大概他隨身携在身邊，因為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記》中也記載：「閱《經世文編》十餘首。」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唐鑑要他治義理之學，但他仍念念不忘地問道：「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咸豐九年他寫成著名的《聖哲畫像記》，其中清代學者即首舉顧炎武。他說：

曾國藩的成學經過

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

可知他所景仰的不是乾、嘉時代共奉為考證始祖的顧炎武，而是道光以下群推為經世儒宗的顧炎武。

曾國藩的出身並不是所謂「詩禮世家」，他祇是湖南湘鄉一個半耕半讀之家的子弟。他的父親在四十三歲才考上縣學的生員（秀才）。這樣的身世對於他後來的學術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他的環境使他在中年以前接觸不到當時學術的主流，因此他注定了不能走專業研究的道路。首先我要指出，湖南在乾嘉時代在學術文化上還居於落後的地位。長沙楊樹達在一九三四年的日記中寫道：

讀唐仲勉《陶山文錄》。陶山之學不主一家，然吾湘乾嘉間前輩能了解漢學者僅陶山及余存吾（廷燦）兩人耳。

可見湖南當時和乾嘉經史考證之學是相當隔絕的。湖南在學術思想上急起直追則是道光以後的事。曾國藩早年所受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中年雖已中進士、入翰林院，但他的學術造詣還相當淺陋。他晚年回憶生平，有四次大耻辱，其中兩次都與學問有關。據他說：

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發佾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

「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冷笑而薄之。」

據《年譜》（黎庶昌編）取，第一次是考生員，僅得備他已二十二歲了。第二次是新皇帝（咸豐）嗣位，他上疏請恢復「逐日進講」的制度。這是他四十歲時的事。這兩次在作文和論學上所受的奇耻大辱顯然給他以極深刻的刺激，所以至老不忘。

曾國藩開始認識到科舉時文之外還有一個學問的世界，是他中進士、入翰林以後，他早年讀四書、五經也祇是為了考試，談不上治學兩字。道光十九年他參觀觀了一位朋友的藏書，在《日記》上寫道：「是日閱余所未見書，有《堅瓠集》、《歸震川古文》、鍾伯敬選《漢魏叢書》及諸種雜書。」以一位翰林院庶吉士而言，他的兒聞未免稍嫌寡陋了。道光二十年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以後，他立意要認真讀書。在受命後一個多月，他的《日記》中有一段很長的自誓之詞。其警句曰：

余今年已二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恒，無縱逸欲，以表先人元氣。用知勉行，期有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面。

又云：

誠能日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無愧詞臣，尚能以文章報國。謹記於此。

這裏他一則曰：「無失詞臣體面」，再則曰：「無愧詞臣」，可見他深感自己的學識和他的職位（翰林院檢討）不相稱。這顯然是他發憤上進的動力之一。因此他在自誓以後半年所讀的書大體上是《綱鑑易知錄》、古文、樂府詩、近代文集之類。

但他畢竟是一個有深度的人，既有自知之明，又肯虛心受師友之教，所以很快便在學問的境界上有了大躍。這一發展直接起於理學的刺激。以往論及曾氏與理學的關係，學者首先必提到他的同鄉前輩唐鑑（鏡海）

，次則倭仁。這自然是事實。但是我們細讀他的《日記》，便會發現最先接引他人理學世界的不是唐鑑，也不是倭仁，而是邵懿辰。邵氏論學以朱子為歸，但博覽多通，經學造詣也很高。他不喜歡漢學，然而又不願為門戶之爭。《日記》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載：

邵蕙西來，談及國朝二魏（魏裔介、魏象樞）李文貞（光地）熊孝感（賜履）張文端（英）諸人。申初始去。

這都是清初所謂「理學名臣」。同月二十一日又記：飯後走：邵蕙西處，談及理學，邵言劉蕺山先生書，多看恐不免有流弊，不如看薛文清公（瑄）、陸清獻公（隴其）、張文端公諸集，最為醇正。自慚未見諸集，為無本也。

這兩條日記最可證明最早指引曾國藩治理學的是邵懿辰。因此一個多月後，曾氏果然開始「閱薛文清《讀書錄》」了。邵氏不但指導他讀理學書，而且幫他作修正工夫。《日記》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載：

蕙西面質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偽，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邵氏的「直」和曾氏的服善，同時躍然紙上。

1

曾國藩和唐鑑交往也始於同一時期，但正式問學則在次年七月。《日記》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條云：

又至唐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集》為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平生最喜讀《易》。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學，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學，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良峰（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夜，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掩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蒙也。

這番談論對曾國藩以後的學術生命實有再造之功；他的治學規模就此奠定了。但若非上一年邵懿辰已引他人理學之門，他和唐鑑第一次深談恐怕也不容易如此相契機。《日記》中記他買《朱子全集》在七月十一日，尚在向唐鑑問學前三天，這是邵氏的影響。

曾國藩在《送唐先生南歸序》中說：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間有二三高才之士，鈞稽故訓，動稱漢京，聞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罵譏唾侮。：：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閩之學，特立獨行，詭譎而不悔。歲庚子（道光二十年），以方伯內召，爲太常卿。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之不才，亦且爲義理所薰蒸，而確然知大閑之不可踰。未知於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視夫世之貌敬舉主，與厭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夫！

曾氏此次說他得益於理學，句句都是實情。他指出當時有兩種風氣：一是功名中人，除科舉以外不知世間別有所謂學問；一是漢學之士，治名物訓詁稍有心得便看不起講「義理」的老輩。曾氏的讀書過程中本接觸不到漢學，當然不會犯第二種毛病。但他早年所受的「功名」教育，庶吉士散館後也祇念念不忘作一個合

格的「詞臣」，他很有可能停留在一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的境。所以他遇到邵懿辰、唐鑑之類的師友，「爲義理所薰蒸」，確是一大轉機。我們細讀他的《日記》和《家書》便可發現道光二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之間他在精神上有過一次大轉化。以宗教經驗爲喻，即是由苦修到皈依的過程。關於這一過程的資料十分豐富，此處不能詳引。姑摘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老弟」書中的一段如下：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寶蘭泉者，見道極精當平實。寶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峰先生，寶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遊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是以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鏡海、良峰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

格的第一「詞臣」，他很有可能停留在一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的境。所以他遇到邵懿辰、唐鑑之類的師友，「爲義理所薰蒸」，確是一大轉機。我們細讀他的《日記》和《家書》便可發現道光二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之間他在精神上有過一次大轉化。以宗教經驗爲喻，即是由苦修到皈依的過程。關於這一過程的資料十分豐富，此處不能詳引。姑摘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老弟」書中的一段如下：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寶蘭泉者，見道極精當平實。寶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峰先生，寶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遊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是以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鏡海、良峰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

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是也。

這段話中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它進一步說明了（送唐先生南歸序）中所說在唐氏門下為「義理所薰蒸」的實況。現代人普遍懷疑理學的功用，而且往往以一「偽道學」視之。誠然，偽道學古已多有，但不能因此否認傳統儒生中曾有人真正信仰過理學的。從曾氏道光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

的（日記）來看，我們沒有理由說他對理學的信仰是假的。也有人因為唐鑑的理學思想十分陳舊，毫無新的發明，所以連帶著也看不起曾國藩的理學。其實這完全是切題的話，唐、曾諸人祇是奉程、朱的理學為修身的準則，他們並無意在心、性、理、氣上另立新說。這正如宗教信徒不必人人都發展一套新的神學一樣。

第二、信中「師友夾持」一語甚為吃緊。我們必須瞭解：這是在唐鑑領導下的一個理學靜修的團體，他們彼此監督、互相切磋，因此而收到共同進德之效。儒家不是有組織的宗教，沒有教會和專業牧師，它的精神修煉和道德實踐一向是通過「師友夾持」的方式進行的，宋、明以來尤其如此，清代自黃宗羲等人的證人講會以後，文社、詩社所在多有，但理學講會早成陳跡。唐鑑、倭仁、曾國藩諸人的理學團體是一特殊的例外，其成就不是偶然

的。

第三、信中引朱子為學「須用猛火煮」之說恰可用來形容他在這三年中的精神狀態。無論是讀書或修身，他此時都用的是一「猛火」，表現出一種勇猛精進的氣概。經過這一番「猛火煮」之後，他終於養成了恒心，從此便走上循序漸進之途了。試讀他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給諸弟的信：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恒為主。兄往年極無恒，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一日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荆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朱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預做。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

這正是依照他自訂「課程」來錘練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理學實踐所發生的效果。這種恒心與毅力一直堅持到他死前一日。他是在同治十一年死在兩江總督任上的，（年譜）是年正月二十三載：自上年定以每日讀《資治通鑑》，隨筆錄其大事，以備遺忘。是日已至二百二十卷，因病輟筆，猶取《宋元學案》、《理學宗傳》等書，

披覽大意，自謂身心一日不能開也。

我查他的（日記），此一記載全是實錄。二月初一、初二他還在「閱《二程遺書》」，初三則早晚兩次「閱《理學宗傳》」，他死在初四晚上，（日記）止於二月初三。所以，就曾國藩的成學過程言，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他接受理學的洗禮是最重要的關鍵，他的學問基址便是在這一時期奠定的。

2

曾國藩的讀書之道

曾國藩（日記）咸豐九年五月十二日：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這是他一生所懸的讀書理想。同年四月二十一日他有一封《論紀澤》的長函，「示以讀書之法，宜求博觀約取」。所以他的理想也可以用「博觀約取」四字來

概括。這四個字本是老生常談，但由曾國藩口中說出則特具一種親切而嚴肅的意味，因為他一生都在努力實踐這個理想。更重要的，他的重點是放在「約取」上面，其目的是要造成一種「詩書寬大之氣」（黃宗義語）的士大夫人格。現代社會學中雖有「價值內化」這個名詞勉強可與「約取」相比附，但在精神境界上相去甚遠。曾國藩晚年有一段自我省察的話可以進一步澄清有關「讀書之道」的涵義：

念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饒飭」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下功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是自足矣。

這裏他用《孟子·離婁》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來補充杜預《春秋左傳·序》中的話，更可見他認為讀書的最高境界是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養料，以轉化個人的人格。用《論語》的話說，這便是所謂「為己」之學。他曾將清代學者分為「為人」和「為己」的兩型，而以後者為更可貴。他說：

默念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闕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

為己者少。如顧（炎武）、閻（若璩）並稱，顧則為己，閻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永）、戴（震）並稱，江則為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玉裁）、王（念孫，引之父子）並稱，王則為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苞）、劉（大槐）、姚（鼐）並稱，方、姚為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之中

，先將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功。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豐茂者也。

他劃分清儒的「人」、「己」之界是否一恰如其分，自可爭論，但「為己」是他的中心價值，而且和「自得」、「約取」義旨一貫，這似乎是可以斷言的。這當然祇是一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理想境界，恐怕沒有人能徹底實踐它。曾國藩便自承失敗，他也不能全免於「好名好勝之心」的干擾。一涉「好名好勝」，讀書便是「為人」了。但由於曾國藩時時懸此理想以自勉，他對於「讀書之道」確有親切的體會和通達的見解。從清末到民初，他的《家書》、《家訓》流行甚廣，他的讀書觀因此影響了好幾代的青年讀者。

這裏我要特別指出這一點，曾國藩的讀書觀是發展的，並未停止在最初的成學階段，上面我們已討論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這一時期在他的學術生命史上的重大意義。他的學問大體雖已在

此時定型，但通過實踐，他在已成的規模之內仍隨時有所調整，而且有些調整是相當基本性的。曾國藩是一個有創造力和判斷力的人。他一方面虛心受師友之教，另一方面卻不輕易屈己從人，放棄自己的獨立見解。前引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唐鑑的一番話對他誠有「昭然若發蒙」之功，但他並不默守唐氏之說，他接受了唐氏的程、朱之學，承認義理是學問的主宰。但「義理」在他那裏主要落實在兩個方面：

一是修身律己，即以「主敬」、「格物」、「誠意」等德目來檢查自己日常行為中的動機。一是指讀書時要集中力量抓住書中（無論經、史、子、集）的大道理，並且以書中道理和自己的切身經驗互相印證。基本上這是從朱子「讀書法」中提煉出來的。總之，他重視的是實踐，而不是理論。與唐鑑不同，他並未以理學家自居，更未以承繼道統自任。對於唐氏所劃分的「傳道」、「翼道」、「守道」等名目，他則置於不議不論之列。更值得注意

的是，他在《書學案小識後》之

結尾處還特別強調「無以聞道自標」。這決不是一句普通的謙詞。《日記》咸豐九年二月初八日載：

夜與子序（按：吳嘉賓）粵敘，言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先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

他肯這樣說老實話，這就證明他無意盜「理學家」之名以欺世。咸豐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他指出一個「勤」字、一個「謙」字，並在《日記》中說：「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倘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但這是人人都能「聞」之「道」，不是一般理學家所說的那個「道體」了。

3

曾國藩的讀書觀點前後變化得最大的是在考據之學方面，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他在「致諸位老弟」的信中說：

蓋自兩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為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

此時他正在唐鑑的思想的籠罩之下，所以這裏所反映的也完全是唐氏關於義理、詞章、考據的評價。依照這個看法，曾國藩應該終身不會涉考據學的樊籬。然而不然，《年譜》道光二十六年載

夏秋之交，公病肺熱，僦居城南報國寺，閉門靜坐，携金壇段氏所注《說文解字》一書，以供披覽。漢陽劉公傳瑩，精考據之學，好為深沈之思，與公尤莫逆，每從於寺舍，兀坐相對竟日。劉公謂近代儒者崇尚考據，故精神費日力而無當於身心，恒以詳說反約之旨交相勸勉。

據此，則至遲在道光二十六年曾氏已開始讀考據的著作，這大概受了劉傳瑩的影響。雖然他們都視考據為第二義的學問，但他們顯然也同樣承認，生在乾嘉以後讀經書的人必須通過考據的關口。此後他在《日記》中不斷留下讀清代考據家著作的紀錄。舉其要者如顧炎武《日知錄》（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同年十二月十六、十七日）、王念孫《讀書雜誌》（咸豐九年正月十六日）、《戴東原集》（同年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日）、趙翼《陔餘叢考》（同年三月二

十八日）。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同治元年五月二十日）、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戴震《緒言》、錢大昕《聲類》（同年同月二十八日）、《王念孫文集》（同年二月初四）、《錢大昕文集》（十駕齋養新錄）（同年五月初一）、江藩《漢學師承記》（同年同月廿九日）。他對高郵王

氏父子的訓詁尤為傾服，故《聖哲畫像記》三十二人中以王氏為殿（參看《日記》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十條論王氏父子經訓之精核）。但最能代表他後期對於考據學的看法的則是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論紀澤》一信，此信結語說：

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炎武）、閻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群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

這才是他學問成熟以後的見解，與早年「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的態度，相去何止萬里。他不但在中年以後勤讀清代考據家著作，而且論學方式也轉為注重「證據」。姑舉兩例以說明之。咸豐

八年十一月初四日他讀友人吳嘉賓的《詩經說》，評曰：

夜，閱子序《詩經說》，學有根柢，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處，特證據太少，恐不足以大鳴於世耳。

這一評論的觀點基本上取自考據之學，若在道光二十三年前後，他決不會如此說。第二例是他晚年《題俞蔭甫《群經評議》、《諸子平議》後》一首五古詩。在「旁證通百泉，清辭皎初雪」句下，他自注曰：

王氏（按：念孫、引之父子）立訓，必有確據。每譏昔人望文生訓，或一字而引數十證。其反覆證明乃通者，必曲暢其說，使人易曉。

此時他已完全瞭解「立訓必有確據」及「一字而引數十證」這種考據式的重要性。他不但評論時人的著作時遵用考據的標準，而且晚年研究禮經也以考據自律，同治五年九月的兩條《日記》可為證。

閱《儀禮·士喪禮》，以張櫻若（爾歧）句讀，張臬文（惠言）圖為主，而參看徐繼畲《乾學》、江慎修《永》、秦味經《蕙田》諸書。（廿一日）閱《讀禮通考》、《疾病》、《正終》（二卷）、《始死》、《開元》、《政和》、《二禮》、《書儀》、《家禮》等，考證異同，（廿九日）自己甚至在進行某種程度的考據工作了。

以上追溯曾國藩對考據之學的態度先後變化，並不是要證明他中歲以後已轉為考據學家，而是要借此說明他的「讀書之道」與年俱進，一直在擴大發展之中，而他之所以能夠發展，則又由於他具有一種開放的求知精神，這一精神尤其表現在「轉益多師」上面，即從四面八方吸收師友的長處，上面已指出，他的「義理之學」得力於邵懿辰、唐鑑、倭仁，「考據之學」則啟發於劉傳瑩，他的「詞章之學」，最初則頗受何紹基（子貞）的激勵。他曾在家書中說何氏「各體詩好：遠出時手之上，（而）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作幾首。」他的古文私淑姚鼐桐城派，但也淵源於朋友間互相切磋，從《歐陽生文集序》與早年《日記》參伍以求，吳嘉賓（子序）、孫鼎臣（芝房）兩人的影響似乎最大，但更可貴的是他在「博觀」中不忘「約取」，終於完成了自己特有的「讀書之道」。

4

【結語】

曾國藩在《日記》和《家書》中談學問和讀書，都是根據自己的切身體驗而來的。《日記》的作用主要在自警，《家書》的對象自然是他家中的子弟。所以此中並無門面語；他所說的或者是已實踐的，或者是仍在實踐之中但尚未能甚至永遠無法完全作到的。就這一方面說，他的《日記》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從不間斷的實踐。他大致有一個指導性的讀書原則，即生書必須快讀以求廣博，舊書必須熟讀以求約取，因此在《日記》中我們看到種種不同名稱的讀書方式，如「溫」是溫習已讀的舊書，「圈」是精讀而加以圈點，「讀」是認真的研讀，「閱」或「看」則多半是瀏覽生書或非經典性的文字，所以「看」可以包括小說，如《綠野仙踪》、《儒林外史》、《水滸傳》、《紅樓夢》等，對於他最欣賞的詩賦之類，他有時還「朗吟」或「誦」。一般地說，他在較為閒暇的時候，每天「溫」故「閱」新，交互進行。但在忙亂的日子裏，如打仗或途中，則以「溫」舊書為常。總之，他差不多真正作到了「手不釋卷」的地步，如同治五年四月十九日他在剿捻途中記道：

前所閱《選舉考》十一、十二卷不甚仔細，昨日重看三十餘叶，本日重看二十餘叶，車中搖簸，殊費目力耳。

又如同治七年底，他從金陵路程入京，途中四十多天他每日在「溫」《左傳》，或閱《國語》、《戰國策》。這樣的實踐精神確不多見。

從學問的整體出發，他讀書自是以成就人格為最高的理想。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完全不講求實用。他為了一經世的目的而讀書的情況在《日記》中也隨處可見。姑舉一例，以概其餘。《日記》同治六年十月初五日。

余閱《瀛寰志略》四十叶，蓋久不看此書，近閱通商房公牘，各外洋國名茫不能知，故復一涉覽耳。

這一年他雖留任兩江總督，但又加大學士銜，總理衙門要他預籌與外國換條約的事宜，所以從十月初五到十一月初八，他讀了兩遍《瀛寰志略》。

曾國藩治「義理之學」而無意人《道學傳》，治「考據之學」而無意人《儒林傳》，治「詞章之學」也無意人《文苑傳》。但當時及後世的公論，他的詩文在晚清文學史上都應該佔一個位置。關於他的湘鄉派古文，眼高一世的章炳麟在《校文士》中曾說：

善敘行事，能為碑版傳狀，韻語深厚，上攀班固、韓愈，愈之輪，如曾國藩、張裕釗，斯其選也。

章氏又在《薊漢微言》中說：元清以外夷入主，兵力亦盛，而客主異勢，故夏人為文猶優美而非壯美。曾國藩獨異是，則以身為戎首，不藉主威，氣矜之際，其文亦壯美矣。

這是很高的評價了，關於曾氏的詩，我僅引錢基博的論斷於下，不更詳及。錢氏《現代中國文學史》云：

晚清名臣能詩者，首推湘鄉曾國藩，後稱張之洞。國藩詩學韓愈、黃庭堅，一變乾嘉以來風氣，於近時詩學，有開新之功。：：：國藩識巨而才大，寫縱橫談詭於規矩之中，含指揮方略於句律之內，大段以氣骨勝，少琢磨之功。

這也是很公允的評判。

曾氏於詩文造詣獨高，主要是因為他的才性本近於此，且早年即浸淫斯道，愛好特深，唐鑑雖告戒他於詩，文不必用功，他並沒有屈己相從，但他卻時時警惕自己，不可沈溺於此。

咸豐九年二月初一《日記》：

又作詩三首十六章畢，中飯後，鄧彌之來，與諸君論詩。余在軍中，頗以詩、文廢正務，後當切戒。

又咸豐十年八月十一日：

是日又接沅弟（曾國荃）信，極論文士之涉於空虛，勸余遠之，其言頗切當。

5

另一方面，他讀詩、文也念念不忘要洗濯自己的胸襟，培養自己的人格。《日記》咸豐九年四月十七日云：

因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家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蕭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獨不免計較將迎，又何小也！沈吟玩味久之，困倦小睡。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又記：

夜閱陶詩全部，取其尤閒適者記出，初抄一冊，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間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誦誦，洗滌名利爭勝之心。

用這樣的態度讀詩顯已超越文學的欣賞，而進入道德修養的領域了。他身名利熱鬧場中，故特別選出曠遠、閒適的詩來對症下藥。第二條日記是在死前兩個月寫的，尤可證他堅持實踐其「博觀約取」的理想，直到最後時刻。由於他對這一理想堅信不移，他一再要把衣鉢傳給其子紀澤。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論紀澤說〉

爾七律十五首圓適深穩，步趨義山，而勁氣倔強處頗似山谷，爾於情韻、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詼詼之趣，一曰閒適之趣。談詼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談詼。此外實不多見。閒適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傅均極閒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為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爾胸懷頗雅淡，試將此三人之詩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

五天以後（三月二十八日）他又追補一信給紀澤，重申其意曰：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為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閑遠，則可化刻為厚。余字汝曰劫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閑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事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昔歐陽修與人言，未嘗及文章，

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現在曾國藩教子，則反其道而行之，惟談詩文，不及吏事。這是因為曾氏深信人必先能「潤身」，然後才能「及物」。如果我們一定要說他是理學家，那麼至少也得承認他是一個別創一格的理學家，不但與唐鑑不同，且與絕大多數宋、明理學家不同。他徹底打通了「義理」與「詞章」之間的壁壘。

與曾氏同時代的陳澧曾提出「士大夫之學」與「博士之學」的分別。他認為士大夫之學比博士之學更為重要。所謂「博士之學」指「專明一藝」；所謂「士大夫之學」，則指「略觀大意」、「存其大體」。用現代的話說，「士大夫之學」相當於通識，「博士之學」則相當於專家。曾國藩所嚮往，所實踐的正是「士大夫之學」。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二日他親書新撰《聖哲畫像記》手卷，次日（二十三日）寄回家中，並致書他的三位老弟說：

吾生平讀書百無一成，而於古人為學之津途，實已窺見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緒。於此再告澄、沅、季三弟，並諭紀澤兒知之。

可見他對此（記）的重視。這篇文字代表了他成熟時期關於學問

的整體見解，其中義理、考據、詞章兼收並蓄。自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三年）「猛火煮」以後，他的學問境界又躍進了一層。這是十幾年（一八四三—一八五八）中「慢火溫」的成效。他說「平生讀書百無一成，而於古人為學之津途，實已窺見其大」，這是很忠實的自述。「百無一成」，因為他沒有去任何「專家」的道路，「窺見其大」，因為他的整體成就屬於「通識」的範圍。今天西方所謂「通識」，淵源於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的教育也以塑造完美的人格為最高的理想。從這一點說，曾國藩的「士大夫之學」未嘗不與西方的人文主義教育有相通之處。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教育因科技的興起而走上「專家」化的路向，但西方思想家、教育家至今仍有不少人關懷著人文的「通識」。「士大夫」的時代在中國已一去不返了，繼之而起的則是現代「公民」。然而「公民」離不開「通識」。

如果撇開具體內容不談，從整體的精神著眼，那麼曾國藩的「士大夫之學」對於中國現代的教育是不是還能有啟示呢？這是值得我們繼續思考的問題。（完）

（本文亦將於《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一卷二期冬季號中刊出）